

欧阳卫民 著

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传统经济思维弊病

中国古代经济哲学简论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的合理内核

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四大传统观念

《六韬》与现代企业管理

《吴子》与企业管理现代化

《圣经》与《论语》义利观一致

孔子富民思想剖析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

~~欧潮平~~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小平

封面设计:穆志坚

书 名: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

编著者:欧阳卫民

出版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西南财经大学内)

邮编:610074 电话:(028)7763785

印刷者: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印刷厂

发行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9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1995年6月第一版

印 次: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2000册

定 价:15.00元

ISBN7-81017-987-x/F·814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欧阳卫民送来他的新作稿《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嘱我写序，这使我感到双重的意外。第一重意外是，尽管他是一位经济学博士，但现在从事的是非常具体非常繁忙的金融管理工作，想不到他仍然孜孜于学术，笔耕不辍。第二重意外是，尽管经济学界行家甚多，而我对于经济学是一个完全的外行，想不到他偏偏决意要我写序，至为恳切。我的确不会写，就说说由这两重意外引发的感想，权作缴卷。

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有些人对于文化和学术的前途怀有一种忧虑，仿佛情况到了天下沸沸扬扬，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地步了。我始终没有这种惶恐感。据我观察，我周围的好些朋友也很安心地坐在冷板凳上，用功地做着学问。至于有人改行经商，那是人各有志，本来就不必勉强。做学问是最起哄不得的事情，必须耐得寂寞，才能做得下去。做学问也是最勉强不得的事情，必须有真兴趣，才能做出成绩来。文化和学术是社会的财富，但具体的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过程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切精神杰作都是个人在寂寞中独立劳作的产物。世上任何时候总是有真正爱文化的人，他之从事文化仍是性情所驱，不得不然。所以，不管市声如何喧嚣，人

心如何浮躁，他仍能心静如恒。欧阳君履职于国家最高金融机构，眼观四面商海，耳听八方市声，可说无日不面对着种种机会的诱惑。他却独爱当今最受冷落最无实利的学术，用时人眼光看，简直是迂。也许他确实迂，但迂得可爱，迂得可敬。毫无疑问，比起在学府坚守学术阵地来，从政或经商的知识分子要保持学者的品格和文化的眼光是更加难能可贵的，而且我相信，其福泽所及必定不限于学术。

欧阳君是专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所著《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业已问世，填补了经济史研究中的空白。现又将近年所著论文结集出版，内容涉及中国的经济哲学、经济管理思想、货币和价格理论、近代实业精神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史问题，而中心则如书名所示，旨在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的支配关系和正负影响。他执意让我这个外行写序，据我揣摩，正是为了听一听外行的意见。我读儒家典籍很不系统，读时也未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留意过。印象上一直把儒学看作一种以人格修养和人际关系和谐为宗旨的伦理学说，而以此指导一切事功包括经济，其弊是阻滞了经济的发展，其利是约束了食欲的膨胀和保护了社会的稳定。当今中国一方面亟需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面临信仰失落、道德失范、腐败、贫富悬殊等严重的精神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情形使得分析儒家文化之利弊的工作变得十分重要也十分复杂。我对颇为时兴的重建儒家信仰的主张不以为然，因为儒学本身的局限使它并不具备根本解决现代人精神生活问题的能力。但是，在此转型时期的当代视野中，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按照专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认真检讨其得失，无疑不但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所以，我认为欧阳君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

真正是外行的空发议论，欧阳君见笑了。读者诸君见笑了。

周国平

1994年8月23日

目 录

●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	(1)
●中国传统经济思维弊病·····	(9)
●中国古代经济哲学简论·····	(15)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之要义·····	(22)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的合理内核·····	(30)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37)
●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主要成就·····	(45)
●中国古代的反通货膨胀理论·····	(57)
●中国古代价格管理思想·····	(65)
●中国消费思想的主题·····	(75)
●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四大传统观念···	(93)
●论近代中国社会改革思想·····	(101)
●论近代实业家人事管理意识的变革····	(108)

●论近代中国民族实业精神·····	(113)
●《六韬》与 modern 企业管理·····	(118)
●《吴子》与企业管理现代化·····	(134)
●《圣经》与《论语》义利观一致·····	(143)
●单旗子母相权论新诠·····	(145)
●孔子富民思想剖析·····	(150)
●商鞅、韩非的重农抑商思想·····	(155)
●早期的中国平均主义·····	(164)
●论“物产证券”、“能力本位”、 “虚粮本位”·····	(173)
●孙中山的货币思想·····	(251)
●一个银行家的成功经验·····	(259)
●土地权力论·····	(270)
●后 记·····	(279)

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

儒家文化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它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经济生活也不例外。本文试就其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加以探讨。

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中国经济主体的被动性

国民经济主体应该说是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人类自身生存状况,主要靠人本身。然而,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成了人之外而又主宰人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不屑一顾、不知天命。孔子说,富裕如果是可以追求的,那么为人赶车他也不在乎;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我行我素,任其自然吧。言外之意,富贵在天,并非人为。

儒家这种经济主体天命观,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停滞。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埋没了。到处可以看见的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人贫困不堪而内心并不骚动,贫于财富而富于情感,生活清寒却对赚钱之事冷漠。

经济主体天命观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中国封建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社会

里，即便赋役和地租剥削率不变，人们的经济状况由于天时地利的变化也会波动很大。岁美则穰，生活相对宽松；岁凶则恶，生活极端拮据。“靠天吃饭”这种想法就自然形成。此其一。其二，中国封建政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专制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贫富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一个人勤勤恳恳地从事耕作或工商业，很难成为富翁，相反各种机遇（如政治提拔，商业垄断，科举道路，裙带关系等等）却让人腰缠万贯、权倾一时。而机遇并不具有规律性，人们觉得好象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玄妙而虚幻的力量在左右这一切，这就是天命。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除了皇帝和极少数权贵，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生杀予夺全在统治者，区区贫富算得什么？因此，国民经济天命观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残酷的专制政治合成的产物。

二、“存天理，灭人欲”

——中国经济动力的绝弃

禁欲主义几乎是所有宗教所倡导的。儒家文化虽不是一种宗教，但却近于宗教，这已是哲学和宗教界所共同承认了的。

佛教、伊斯兰教都提倡禁欲，但这里只用新教的禁欲主义同儒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进行比较。

新教禁欲并不否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必要性。《圣经》有关经文甚多。如“财富保护富人”，“勤劳致富”，“收获季节大睡特睡的家伙不光彩”，“穷人挣扎生活，富人享受生活”等等。新教的禁欲仅仅表现为对财富的珍重、爱吝和追求，其结果为资本的不断积累。

儒家的禁欲则不同。首先它不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发财致富欲在舆论上持否定态度；其次儒家的禁欲并不表现为对现有财富的爱惜，结果并不促进资本积累，因为节余下来的财物总会在某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花掉。因此儒家的禁欲，实质上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因素里，没有比存在于社会成员心中的原始的强烈致富欲更巨大。恩格斯讲过，卑鄙的贪欲是私有制社会的动力，追求个人财富是私有制社会唯一的具有决定性质意义的目标。而儒家文化却要消灭它，岂不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新教既宣扬为了上帝而节俭，又宣扬为了上帝而致富，把禁欲等同于反消费，如此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都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上肯定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源泉的。与此相反，儒家的禁欲却表现为知足知止、安贫乐命，远离经济生活，而不注重为积累而节约。该禁的欲没有禁，不该禁的欲却特别认真。因此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步。孔子说，放乎利而行，多怨。孔子对于人的利欲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儒家文化指导下的政府对于经济的态度，必然是消极的和压抑的，人们对经济生活缺乏热诚，整个经济气氛沉闷。

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中国经济效益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注重经济效益。既没有投入产出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概念，纯以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计算过农业劳动耗费量，怀疑过家庭手

工业的合理性，认识到自然经济造成的巨大浪费，研究过经济核算问题，为追求生产力进步、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催促新经济现象诞生的社会土壤十分瘠薄。

然而另一方面，非难功利的说教却不厌其烦，讲得头头是道，义正辞严。它宣称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些儒化官吏无不讳言财利，从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一心只想如何束缚人们的思想，按照封建道义（亦即所谓“天理”）摆布天下。

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思想的毒害。

修铁路、建工厂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以其代替人力畜力运输、家庭手工业本无什么惋惜可言。然而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还为此等问题争论不休呢！反对派指责，这些近代生产力象征严重伤风败俗，破坏风水，有碍男女之大防，使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破产，瓦解自然经济及其相应的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明知新的生产力那巨大的效益，却因为担心封建道义的破坏而没有不坚决反对的，以至于花钱买下外国人修的铁路而拆掉，捣毁近代民族实业家惨淡经营的企业……。你说，多么荒唐啊！

明清以来实行愚不可及的海禁政策也是一例。许多进步人士反复劝告朝廷开放国门既可以增加关税收入，促进对外贸易，又能保证沿海人民的生计。可是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就是充耳不闻，他们害怕中外接触，会动摇封建道德体系，宁愿让沿海人民生计窘迫，贫困不堪，也决不对外开放。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迫打开国门，但中外接触仍有许多限制。要是外国人愿意的话，反动政府还想关门大吉呢！

类似例子还很多，象所谓“奇技淫巧”当禁、货币流通

当限、祭祀凭吊当铺张等等。它“遵循”伦理却忽视经济规律，只顾一时经济平衡，往往牺牲经济增长。其消极影响十分严重。

四、“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

——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

稍具中国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在战国时候，就已广泛采用牛耕铁犁，而时至当今，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主要象征仍然是铁犁牛耕。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文化为什么如此滞留不前？

假若我们将中国的其他农业生产力象征、手工业产品数量和质量、商业组织形式、货币流通理论和制度、交通状况、都市建筑等，同西方同期相比，我们会发现，历史愈是接近现代，我们愈是惭愧。

中国是最早采用纸币制度的国家，可是直到近代，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发达的货币经济；二千年前就出现了十分繁荣的都市，可是在统一的帝国政治下，城市始终软弱，没有独立的意义；长期以来只有伦理和礼仪规范，缺乏完善的法规制度，尤其是商法之类，缺乏近代资本主义投资所要求的理性的法律程序，以世袭制、宗法和政府首脑兼任这一切。在儒家那里，物质福利不是诱惑的源泉而仅仅是彰扬道德的重要手段。先秦诸子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后世不敢越雷池一步，西学东渐时，仍有人在津津有味地咀嚼而丝毫不觉陈腐……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儒家文化是不是有问题？

儒学告诫中国人，“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

在这种观念指导和激励下，数千年来具有一流头脑的中国人都走上了读书、作官、食禄这条路。“学”的是仁义礼智、治国安邦之术，“官”的是正义明道、吟诗作赋之事。对于那些名落孙山的不幸儒生来说，如果不想作小人的话，也不会投入经济生活中去的。正象马克斯·韦伯所说，儒学培养出一批高级书呆子，除了哲学、文学，其它知识极少，尤其是科技、经济、法律方面的。相反，清教徒则受到《圣经》中如法律知识和经营管理思想的教导，他们把自然科学知识看成是在职业劳动中合理控制自己的手段，而把哲学看成是浪费光阴的把戏。^①

儒士的智慧没有注入经济生活中去，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就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创造过优美的文学和独立而深刻的哲学，却让经济文化长期停滞落后，为什么中国人贫于财物而富于情感。

五、“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中国消费的特殊性

宗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绝对地起阻碍作用。教义不同，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也不同。新教伦理已为马克斯·韦伯证明为资本主义精神源泉。根据他的分析，新教中的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使自己服从于这笔财产，他必须厉行节俭，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同时必须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增殖财富。这样新教就以上帝的意志向人们宣布了两件神圣

^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职责，一是赚钱，二是节约。人生的总目标无非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争做上帝的选民而积累财富，显然这对积累、从而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作用巨大。与新教伦理相比，儒家文化不仅对财富保值和增殖缺乏责任感，而且提倡轻视和浪费财富。儒家在提倡崇俭的同时，对某些特殊的消费项目并未加限制，反而为之辩护、鼓励。这些项目包括宗教迷信开支和家庭外交开支等。儒学认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因此儒学中的节俭不过是为了往后某一项浪费。因此许多人平时节俭，而始终又处于贫困之中。为了娶媳妇、建房子、奉老归山或者为了某一件根本不值得大肆庆祝的事情而耗尽积蓄家产。“破家尽业，以充死棺”，^①“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死以后，乃崇飭丧纪以言孝，盛殓宾旅以求名”，“一殓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②节俭与浪费并存，省约与铺张相随，使资本积累无以形成，“贫穷、节俭、浪费、贫穷”的恶性循环难以摆脱。

六、“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中国人的贫穷神话

一间简陋的房子，就是一间简陋的房子，无论房主是君子、小人。这是明显的道理。其他享受也是一样。

然而儒学并不这样认为。它说有教养的人住在里面，就不觉得简陋，其好处不亚于巍巍官阙！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是以孔子所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为中心思想编造的一套君子居陋室美不胜言的神话。类似逻辑，在中国古籍中到

① 《论衡·薄葬》

② 《潜夫论》中《务本》、《浮侈》两篇。

处可见，并且扩展到吃、穿、行、用诸方面。他们坚信物质生活的贫困不算什么，只要自认为是“君子”，就可以对此漠不关心。孔子称赞颜回“贤”，说他生活极端清苦而不改其乐。一切只要自认为是“君子”，而不是“饮食之徒”、“盗跖之徒”的人，都应该安于目前的贫困，一心扑在自我修养上。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义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同的。后者认为贫穷是耻辱，穷人给上帝脸上抹黑，富有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儒家这种观念的形成，至少有下面一些原因：

第一，在普遍贫穷的中国社会里，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必须给大众包括那些穷书生以不损体面的安慰，给在贫富斗争中失败的人以安慰。

第二，儒家注重消费的实用性。强烈的实用观念使它敢于蔑视财富价值上的优越感，让人觉得那些“富而骄”的家伙愚昧、可笑。

第三，儒家文化推崇内省，突出心理享受和精神愉悦，强调自我感觉和从学问道德方面用功，因此贫困的处境并不会引起内心的骚动，人们相信儒学教义并且能够实行。

本文原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一九九二年第3期

中国传统经济思维弊病

一、教 条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在普天恪守古代圣贤“不殖货利”的教条下，由于现实经济问题所迫而勉强产生的。西汉哀帝时，师丹呈限田方案，谓“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① 孔子很少谈“利”，孟子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直到中国近代，还有人反复奏请朝廷“戒言利”，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缺乏预见和理论体系，是一种权宜之策，穷于应付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经济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平时不注意也不愿意主动研究经济，“士尚拘虚。穷年矻矻，比迹书鱼”，^② “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从而高之”，^③ 一旦遇到经济问题，这个极不平坦的抽象思维猎场，除了从线装书上找寻陈法故策外，再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④ “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法，欲以为治”。^⑤ 贞观二年，王 对太宗说：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
③ 《潜夫论·务本》。
④ 《潜夫论·潜学》。
⑤ 《文子·上义》。